

未完成的系譜

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

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3。533頁。

汪榮祖*

現在的學術著作很講究關鍵詞，以凸顯一篇文章或整本著作的主題，「系譜」無疑是王汎森先生這本著作的一個重要關鍵詞。所謂「系譜」，原指有系統地記錄動植物祖先情況的檔案資料，以推斷遺傳特性與確定個體間的親緣關係。作者將「系譜」一詞，用之於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自然會使讀者期盼這是一本對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頗有系統的論述，更期盼作者能展示眾多的思想與學術因子，無論「明流」或「潛流」，在中國近代史進程中的傳承與相互間的「親緣」關係。作者年富力強，自是作這一艱鉅工作的理想人選。可惜作者並無意於「系統」，只想「探討道光到1930年代大約一百年間思想學術變化中的幾個問題」（頁i），不免令讀者有點失望。不過，作者倒不必特別聲明他無意「寫一部通論近代思想、學術的書」，因為書名既然不是思想學術通史，無人會期盼一部通史。

從書的內容看，作者的確無意譜系，因為這厚厚的一本書，並不是為了探討「幾個問題」，或研究「比較為人所忽略的層面」而寫的「專著」（monograph），而是不同時候所寫單篇論文的一個集子，篇與篇之間並沒有多

* 中正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兼文學院院長

大的關聯。作者自己亦開宗明義地說：「這些文章是隨著不同的需要而寫成的」（頁 i），因而不得不長短不一。這些「機緣各異」的文章被編為三類：「舊典範的危機」、「傳統與現代的辯證」、「新知識分子與學術社群的建立」。這三類都是很重要的議題，假如作者不只是將發表過的舊文章收錄進來，而是能更上層樓，在舊文的基礎上作深入而周密的研究，應該可以寫出一部令人刮目相看的巨著。

書中收錄的二十篇文章（包括兩篇附錄）當然都屬於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範疇，而這一範疇內的研究成果在近二、三十年來已頗豐碩，任何新的研究必須要在舊的基礎上，作進一步的探討。所謂引用別人的著作，未必要附從；所見不同者，更可以駁正糾謬，但不宜不聞不問。這本集子獨自發揮的較多，而引用他人的研究成果較少。有關方東樹、康有為、章太炎、劉師培、何震，以及梁啟超等人的思想與學術，現代學者蕭公權、朱維錚、姜義華、沙培德(Peter Zarrow)、施耐德(Axel Schneider)等人的研究，應該值得作者參考，並從中獲益。

此書開卷第一編的第一篇〈方東樹與漢學的衰退〉，對方東樹有高度的評價，若謂方「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寫出了《漢學商兌》這部奇書」（頁 5）、「提出一種新的詮釋態度」（頁 17）、「為清季漢宋融合之風啓其先端」，是「思想復興運動的前驅」（頁 20）、「《漢學商兌》一書也標誌著漢宋相融的新發展」（頁 22）。其實，方東樹痛批漢學這段公案相當複雜，不僅僅是「為學問而學問」的問題，而牽扯到宗派、意氣與人品，值得細究。作者說：「清末章太炎(1869-1936)提醒時人：方東樹對聲韻訓詁之學很有素養，而且他對漢學的攻擊並非全無根據」（頁 22）。其實章太炎只是說：「東樹亦略識音聲訓詁」，「略識」與「很有素養」之間似乎尚有不少落差；章太炎還說：「其（方東樹）非議漢學，非專誣譏之言」，按誣者，乃指捏造事實以陷害別人；譏者，乃抵賴誣妄之謂，用詞相當尖銳。「非專誣譏之言」，表示方仍然說了不少誣譏之言，其嚴重性絕非「並非全無根據」可比。更重

要的是，章太炎接下去又說：「東樹本以文辭爲宗，橫欲自附宋儒，又奔走阮元、鄧廷楨間，躬行佞諛，其行與言頗相反」，直把方東樹視爲言行不一致的卑劣小人，在學問上也只是一名文士，強以宋儒自居而已。太炎並曾指出：由於戴震的聲名使天下學子重經儒而輕文士，桐城派文士雖想依傍程朱來講桐城義法，但得不到要領；姚鼐想當戴震的學生，也沒有被接受，因而感到羞辱，引起日後的攻伐。作者也許不同意章太炎對方東樹的負面評價，可惜我們沒有看到回應。

此一「公案」的緣起，乃由於江藩於嘉慶年間寫了《國朝漢學師承記》來區別漢宋門戶，未久於道光初年又寫了《國朝宋學淵源記》，將桐城派諸子完全排除在外。桐城派早與漢學家有瓜葛，《漢學師承記》出版時，桐城派的主將姚鼐已死，但姚門弟子方東樹反應最爲強烈，除了嚴厲譴責江藩外，同時也攻擊所有與漢學有關之人，特別是針對戴震與揚州學派，甚至連錢大昕也不放過。由於方東樹的《漢學商兌》頗多謾罵，故無太大的學術價值；然因其激越，頗贏得桐城、陽湖兩派文士的禮讚與聲援。方氏於1815年去世後，他的書在同光年間一再重印，則主要因爲曾國藩以當世方苞自居，以明道救世爲己任，方東樹的聲名因而大著。然而在大變局之下，在西學的侵襲下，漢宋火併正好加速漢宋的兩敗俱傷，實在談不上真正的漢宋調和與復興。我們如細讀章太炎的〈清儒〉以及參考上海復旦大學教授朱維錚對晚清學術史的研究，便能很清楚地瞭解方東樹此一公案的底蘊。

第一編裏比較醒目的一篇是〈清末的歷史記憶與國家建構——以章太炎爲例〉，因有關記憶與歷史的研究已成爲當今的顯學。記憶是個人的回想，歷史可以說是「集體的記憶」(collective memory)。自傳在現代史學書寫中最能銜接記憶與歷史，因自傳是回想早年的生活史；歷史人物自傳的研究也就成爲熱門課題。作者以章太炎爲例，沒有從章氏自訂年譜著手，而將歷史與記憶合而爲一，僅當歷史看待，所以認爲清廷禁毀史書就是壓抑漢人的歷史記憶；清末漢人歷史記憶的恢復，則導致清廷的滅亡。其實，清廷要「抹除」

的只是有礙其政權正當性與合法性的言行，這些言行由於文字獄與禁毀政策而逐漸在人們的心目中遺忘，但仍然存在於行諸文字的記憶之中。章太炎於清季革命時期並非真要恢復漢人真實的歷史記憶，而是作為詆毀滿人的宣傳，以收排滿、倒滿之效。民國以後，他已不排滿，撰寫《清建國別記》時已屬學術性的歷史研究，旨在重建消逝的過去，並不是如作者所言，「復返」被清廷「抹除」的歷史記憶。

章氏家族「都不穿清代衣帽或官服入殮」（頁 105），並不特殊，在所謂「男降女不降，生降死不降」的默許下，習以為常，不足以稱之為反清的「潛流」。太炎喚起漢族記憶的大動作，是發起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並起草〈紀念書〉，有志於作「記憶」研究者，應該大書特書。筆者與作者看法不同的是，清廷並沒有必要一味「抹除」漢人的歷史記憶，反而要把清帝國「建構」到中國的歷史記憶中去，錢穆初不知「當時的皇帝是滿人」（頁 96），似乎可以從這一層去理解。作者說：「歷史記憶的復活使得人們把『國』與當今的朝廷分開，最終拒絕止於體制內變革」（頁 108）。其實，三千年中華帝國的歷史記憶中，朝廷就是國家，並沒有現代西方的國家觀念，也就沒有可資「復活」的記憶。把朝廷與國家分開是受到西方「民族國家」概念的衝擊，中華帝國在西方壓迫下不得不「參與列國之林」(joins the family of nations)。若將滿清垮台歸之於歷史記憶的復活，似乎過於簡化辛亥革命史了。此外，將這一篇歸之於「舊典範的危機」，似乎不如稱之為「新典範的契機」。

這本集子中當然有些不錯的論點，例如，收錄在第二編中的〈從傳統到反傳統〉一文，旨在「探討尊孔與復古這兩種精神動力為何能導出一開始完全意想不到的反傳統結局來」。他探討尊孔，以廖平、康有為為例；復古，則以章太炎等國粹學派為例（頁 111）。作者所謂「反傳統的傳統主義」確是很有趣的現象，關於這一點大可參照蕭公權先生數十萬字的《康有為思想研究》一書。蕭先生曾經指出：康氏尊孔既為了維護傳統，也為了解決現實

問題，用傳統來「走私西學」，用孔子來掩護他變法；然而，由於在重新詮釋儒家傳統以應變法需要之際，全面否定了古文經，結果懷疑古文經非真之餘，無意間洞開了懷疑整個儒學傳統的大門。筆者也寫過〈打開洪水的閘門〉一文，指出康有為得到始料未及的反傳統結局。這些看法都已印證了此書作者所說的，「尊孔也可能發展出令人意想不到的、破壞力極大的反傳統來」（頁 121）。至於說到「復古與反傳統」，作者認為「學術界有一個相當流行的看法，認為晚清的國粹主義與保守主義是同義詞」（頁 121）。幸好由於不少近人的研究，這種流行的看法也早已經不流行了。

第二編所收文章中也討論到西洋文化，特別在詞彙與概念上，往往經過日本而傳入中國，重申了這一方面眾多的研究。作者說「戊戌可以說是一種『日本模式』的變法」（頁 192），是毫無疑問的問題，連康有為都要光緒皇帝效法明治，並於戊戌年進呈〈日本變政考〉。作者長篇討論梁啟超「新史學」（頁 210-219），使我們重溫一次耳熟能詳的梁氏史觀。作者認為康有為的烏托邦「超過它原有的脈絡及傳統的解釋，而這些含義中有不少接近於現代的社會主義思想」（頁 223），與蕭公權先生對此極為完整的論述相對照，似乎不謀而合。作者說「何震大力提倡婦女解放論」（頁 234），使我們想起沙培德於十年前提出的「無政府女性主義論」(anarcho-feminism)。作者若願與蕭、沙兩先生做些對話，也許更能吸引讀者。此編中的〈近代知識份子自我形象的轉變〉一文有問，「何以現代中國的知識份子一步一步失去制衡統治者的力量」（頁 301），似乎問錯了問題，因為中國知識分子從來就沒有起過制衡統治者的作用。作者提到晚清出現的「四民皆士」觀念（頁 279），將農工商提升到士的位階，很有意思；應該也一提更有意思的、薛福成的四民倒置說，將不事生產的士置於四民之尾。

第三編裏的學術思想重鎮是傅斯年與陳寅恪，作者已出版的博士論文對傅斯年有更全面而完整的論述；有關陳寅恪部份，作者一再引用暢銷兩岸的陸鍵東之《陳寅恪的最後貳拾年》，再度表揚陳氏秉持「自由之思想」，「獨

立之精神」，為學問而學問，反對馬列主義，反對政治干涉學術。雖非新見，何妨重提。至於作者認為文革之前，陳寅恪受到「優待」並非「虛有其名」（頁 487），倒是持平之論。

作者在〈價值與事實的分離——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一文中，「將價值與事實分開，並以此區分民國的新舊史學（頁 377-462），以胡適、傅斯年為首的新派與當時西方的學術態度相同，具有「去應用化、去價值化、去道德化、去心性化等特質」（頁 387）。因而「新派學者的這一個基本態度，是民國學術史中非常重要的一頁，影響整體學術發展至鉅，是『價值』與『事實』分離的始點」（頁 389）。作者的這個假設可能有偏差，至少當今德國著名學者盧森(Jorn Rüsen)就深信價值與事實是難以分割的，即使在現代所謂科學的歷史思維裏，「歷史的道德性從來就沒有消失過」(morality of history has not vanished in the scientific turn of historical thinking)。

出版這本論文集的聯經出版事業公司，雖在印製上力求美觀大方，猶未善盡核實之責，以致於留下不少明顯的錯誤。例如，將「大量中國學生湧入日本」提早到 1896 年起，然後說「戊戌前後中國思想文化中的日本因素便與這一波留學運動分不開」（頁 185）。「大量湧入」顯然是庚子事變以後的事，特別是 1905 年取消科舉之後，所以這一波留學運動是無法趕上戊戌前後的。又誤植章太炎「因為《蘇報》案被清廷關在上海監獄之中」（頁 223），清廷是不可能把他關在上海監獄的，清廷要求引渡他到南京受審而不能，遂與章氏在上海的公共租界對簿公堂，因而轟動一時，外國人控制的法庭只判了章太炎三年；如果他被關在清廷的監獄之中，必死無疑。「顧頡剛以層累造成說為骨幹，解釋上古歷史虛構之過程……當時雖有在杭州詒經精舍的章太炎以數條駁之，但並未能成一系統」（頁 403）。詒經精舍乃太炎早年求學之地，甲午之前就離開了；民國以後，太炎大都住在上海、蘇州兩地。又所謂元代儒士並未受到歧視，乃陳垣之見，而誤歸之於蕭啟慶（頁 277）。「兩派的學報或雜誌是鼎足而立」（頁 381），兩派只能分庭抗禮，無法鼎

足而立。說陳寅恪「不信官書之態度則前後一致」（頁 423），不知陳氏崇尚的《資治通鑑》是否算是官書。舉出類此細微的小謬誤，以供本書的責任編輯於再版校正時之參考。

總之，不同機緣所寫的文字湊在一起，畢竟難以自成系統，我們仍期盼作者能繼續去譜未完成的「系譜」。